

管理的逻辑

Management Logistics

高闯 等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管理的逻辑

高闯 等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管理的逻辑/高闯等著.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096-2573-6

I. ①管… II. ①高… III. ①企业管理—中国—文集 IV. ①F279.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3833 号

组稿编辑: 张永美

责任编辑: 张永美

责任印制: 杨国强

责任校对: 陈颖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1000mm/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07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6-2573-6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前 言

今年4月，我着手整理发表过的论文，将有关公司治理的研究成果汇集成《社会资本、终极控制权与公司治理》一书，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这之后，余兴未消，觉得仍有些颇有价值的成果由于选题原因未能收录，遂生再出文集的想法，于是凑成此书。本书也许内容不如上一本紧凑，但涉及领域较宽、文体多样化、可读性强，因此可以看做是上本书的“姊妹篇”。这里，容我做一个大概的介绍。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有关比较管理学科基础问题的研究。比较管理学堪称管理学理论丛林中的一朵“奇葩”，在东西方特别是美日管理模式的比较研究中曾有过属于自己的辉煌。然而在今天，这朵“奇葩”过早地凋谢了。在今天，中国管理实践已为世人瞩目，从比较研究的视角探讨中国管理实践，实现理论创新适逢其时。为此，我和学界同仁在2009年率先发起创办《比较管理》杂志，举办学术研讨会，并在一年前成立了国际比较管理研究院开展相关研究。在我看来，比较管理之所以成了一门“沉闷的学科”，除了管理实践背景的变化外，学科基础的缺憾是重要原因。我尝试着用默顿的“中层理论”诠释比较管理的研究对象，用解释性研究界定学科性质，并试图引入演化分析方法重振比较管理学。不谦逊地说，这些探索恐怕在国际比较管理学界也属首次。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当运用归纳—演绎二分法分析学科体系时，由于比较管理学科体系建设的重新构思，可能整个管理学的学科大厦也需要重新搭建。

《基于动态耦合的企业管理国际竞争力（EMGC）评价体系》是我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主任基金应急项目研究报告的浓缩版。当时，关于企业竞争力的评价在国际上已有权威机构的标准在应用，如世界经济论坛（WEF）、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评价体系。我理解，管理学部之所以设立“中国企业管理全球竞争力评价体系研究与应用”应急项目，至少出于两点考虑：

一是立足中国情境，二是强调“管理”在一国企业竞争力中的作用。我们把这种认识融入研究实践中，创造性地根据动态耦合理论设计出企业管理国际竞争力（EMGC）评价指标体系。这个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以公司价值为主导的多级指标评价系统，采用了三维动态耦合式的分析方法，并推演出多维组合的企业竞争策略空间集。这一成果对于当时国内方兴未艾的中国企业竞争力评价研究至少是一个有益的“合声”。因此，这一成果先后获得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6）和第三届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基金优秀论文一等奖（2008）。

2006年，在给研究生开设《管理学前沿问题研究》课程时，我讲到了商业模式专题。当时，关于企业商业模式的文献层出不穷，既有个案研究，又有理论探索，但并没有一个系统、直观的基本分析框架。换句话说，有关商业模式的基础理论研究还很不成熟。我非常尖锐地指出了这个问题并谈了一些粗略的想法。后来，我的研究生关鑫很快配合我完成了《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实现方式与演进机理》一文，送到编辑部时，主编认为这是一篇非常棒的文章，毫不犹豫地决定马上发表。这篇论文的新意在于，首次从价值链创新的理论高度和视角诠释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实现方式，这就找到了商业模式创新理论源头和根基。我们还对企业商业模式进行了系统的科学分类，这样，市场上五花八门的商业模式都可以在这个分类系统中找到“归宿”，这就是科学研究、基础理论的力量。从“顾客创造价值”的管理学视角解析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动力及演进机理，也是这篇文章与众不同的地方。后来，关鑫又在我门下读了博士，再去清华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在我的记忆中，从这篇论文发表开始，他后来撰写的论文都在万字以上，“清一色”发表在一流杂志上。由此可见，这是一名基本功非常扎实，悟性、灵性俱佳的优秀学生。

有关集群问题的分析，算是这本文集中最“接地气”的部分。当时，我正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及其演进机理”（项目号70372006）项目，带领博士生们去中关村调研。我们去了用友软件、中科大洋、北京创投等多家企业，还同中关村管委会、长城管理咨询公司共同研讨座谈。当时的中关村，正面临一些大企业“逃离”，许多中小企业“出走”的窘境，甚至有人用“一次性的中关村”这样的极端性话语断言中关村正在走向没落。我们敏锐地撰文指出要理性对待中关村集群的发展与变化，并运用集群广度和深度这些

重要概念进行深度解析。我们认为，从长远来看，集群广度与深度的发育程度是决定一个集群是否具有发展活力与后劲的关键，这一点从美国西海岸的硅谷与东部的“128公路”的演进轨迹中就可以证明。事实上，集群发展短期业绩与长期业绩的取得方式是不同的，如果对集群发展也要进行“政绩考核”的话，那么，管理者的短期行为与长期行为要合理兼顾，集群企业的现实表现与发展潜力在评价体系中也要得到相应显现。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中关村是要 GDP 还是想成为硅谷的问题。这些议论和调研报告有一定影响，后来在新华社内参相关刊物发表。

我同李平博士关于企业家选择机制的对话至今仍然有价值。对话时的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社会一方面呼吁要有一大批适应市场经济活动的企业家，另一方面社会又对目前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行为不满意。我们发现，谁去选择企业家是解释这个矛盾现象的关键所在。究竟应该由政府还是市场去选择企业家？这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厂长是由政府委派、任命的；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家由市场选择并决定。简而言之，中国经济体制是否真正转轨，用一个企业家由谁来选择的机制就可以观察到。中国当时已历经 18 年的改革，企业家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仍然由政府部门选择和确定，企业家的选择机制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事实上，由市场去选择企业家说到底就是要由所有者去选择企业家。但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所有者制度的模糊性，迄今为止，改革已进行了 30 多年，谁去选择企业家的问题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从这个侧面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国有企业改革要“动真格的”是多么的不容易！

我长期从事 MBA 教育工作，摸索出一些 MBA 教育的经验并力图将其提升为管理教育的理论，一些思想在本书中有所体现。我认为，衡量 MBA 教育的指标很多，但最基本的或处于元层次的是两个指标要素：质量和特色。没有质量，中国 MBA 教育就无法融入世界 MBA 教育体系；没有特色，中国 MBA 教育就无法形成自己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显然，质量是个国际化概念；特色则是本土化或个性化概念。在阐述质量指标时，为了直观起见，我借用了质量管理“工程五要素”概念。产品质量如何取决于生产五要素——人（员工）、机（机器）、料（原料）、法（工艺方法）、环（操作环境）。MBA 教育质量如何也取决于这五个要素——教师、教具、教材、教法、教学环境。这样梳理，会大大方便我们的分

析。在国际上，MBA教育有两个学派：哈佛大学的案例教育学派和芝加哥大学的理论教育学派。哈佛培养出若干企业精英，芝加哥则拥有一批璀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究竟哪种学派更适用于中国MBA教育呢？中国MBA生源中有50%来自理工类本科毕业生，20%~30%来自经济管理类，剩下的则是来自其他学科。因此，中国的MBA教育应该更多考虑到中国学生的特点，尽量融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于一体，创造出一种“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兼容学派”。

罕有学者为自己出书“自吹自擂”的，我却成为这“罕有”的学者中的一个。之所以这样做，一个原因是：如果用今天的眼光去审视，的确很难说本书中每一篇论文都有价值。特别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还有一些华彩和个性的文章——比如《论岗位主体管理》、《一种新的企业用工模型——差别序列结构》等——在急速变化的今天也许已经“黯然失色”。不过，无论如何，当时的探索是有意义的，把它保留下来，至少可以成为我求知过程的一个见证，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学术研究的状况，尽管有的文章读起来会感觉多少有一些幼稚。更早的一篇论文《应重视开发管理资源》距今已30年有余，以现在的眼光看是肤浅了，但那是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是中国“管理运动”的启蒙年代，人们甚至还不知“管理”为何物。这篇论文是在我大学毕业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并且得到了王征、彭好荣两位老师的指导。如今，他们都已先后作古，但他们的教诲却犹在耳畔，收录在这里，也算是对两位先生的一种纪念吧。回想起来，我毕业留校进入到大学教师的队伍中，还多少与这篇论文有一些联系呢。

本书在整理过程中得到了硕士生王文杰、杨丽丽、何璐、郭婧、狄程的协助，借此机会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谢意。特别感谢经济管理出版社沈志渔先生、杨世伟先生和张永美小姐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智慧，感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为本书出版提供的资助，感谢所有为本书提供指导和帮助的人们。书中的错误由本人负责。

高闯

2013年7月19日

目 录

| | |
|------------------------------------|-----|
| 第一部分 管理学与比较管理 | 1 |
| 比较管理学的学科基础问题 | 3 |
| 比较管理的研究对象与边界 | 16 |
| 比较管理研究范式的完善与发展 | 34 |
| 新管理理论丛林及其发展趋向 | 50 |
| 基于动态耦合的企业管理国际竞争力 (EMGC) 评价体系 | 61 |
| 应重视开发管理资源 | 81 |
| 第二部分 企业家与企业制度改革 | 89 |
| 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出路 | 91 |
| 国有企业外部环境及面临问题的调查 | 98 |
| 现代企业家的发展趋向 | 103 |
| 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道德秩序 | 108 |
| 文化、战略与企业生产力 | 113 |
| 一种新的企业用工模型——差别序列结构 | 119 |
| 论岗位主体管理 | 125 |
| 第三部分 企业集群与商业模式创新 | 133 |
| 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实现方式与演进机理 | 135 |
| 我国知识型企业的核心能力问题研究及对策 | 149 |
| 虚拟企业的信任关系治理机制 | 157 |
| 基于遗传算法的企业媒介传播策略模型 | 169 |

| | |
|---------------------------------|------------|
| 基于网络分析法的 R&V 非竞争性战略联盟伙伴选择 | 182 |
| 浅论技术引进的全过程管理 | 192 |
| 依托地区产业集群 打造东北企业品牌 | 197 |
| 从集群角度看待中关村企业的发展与变化 | 203 |
| 中关村企业技术创新的集群困境 | 205 |
| 借助产业集群理论提高中关村公司治理水平 | 207 |
| 中关村的六大悖论 | 209 |
| 依托什么开发和建设浑南 | 214 |
| 第四部分 MBA 教育 | 219 |
| “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兼容并蓄 | 221 |
| 中国 MBA 教育的国际化和本土化 | 223 |
| 纵论 MBA 教育质量“工程五要素” | 232 |
| 商学院究竟能为企业做些什么 | 236 |
| 现代大学“智囊团”：理论、实践与制度安排 | 239 |
| 第五部分 访谈与短论 | 251 |
| 管理变革：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 | 253 |
| 谁去选择企业家 | 258 |
| 产业定位与制度创新的双重考验 | 262 |
| 靠什么打造“辽中”经济区 | 267 |
| 品牌群：为城市赚取“精神利润” | 270 |
| “舒丽雅精神”成为活案例 | 272 |
| 短论六则 | 274 |

第一部分



比较管理学的学科基础问题

引言

在管理学的理论丛林中，比较管理学是一朵奇葩。它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在 80 年代形成高潮，到了 20 世纪末逐渐趋于平静甚至有些沉寂。这期间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在跨国界、跨文化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国家间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并非只是由于技术的原因，而更可能是管理或其他因素出了问题。为此，“二战”结束后，在欧洲大陆还曾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论战：欧洲的科学技术并不比美国落后，可经济发展为什么落在美国后面？比较管理研究的序幕也由此拉开。哈宾森和梅耶斯试图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去“揭示工业增长过程与管理间的密切联系”，其代表作是《工业世界的管理：国际分析》(F. Harbison & A. Meyers, 1959)。法默和里奇曼开创性地提出了第一个比较管理理论框架，即所谓的“法默—里奇曼模式”(Farmer & Richman, 1964)。汉默在“比较管理理论丛林”一文中通过回顾已有比较管理研究的理论取向，归纳出比较管理的四大学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综合的比较管理理论分析框架 (Scholl Hammer, 1969)。这一阶段比较管理研究的特点是注重建立概念体系、分析框架，探讨各国管理是否具有可选择性、可移植性和互补性。这是比较管理基础理论探究阶段，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历时约 20 年之久。

“二战”结束后，日本人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创造出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许多产品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 1980 年，日本的 GDP 已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苏联。1974~1980 年，日本经济增长率是美国同期的 3 倍。是什么原因

使日本经济出现奇迹？不少美国学者对日本企业的成功之路进行探索，于是出现了比较管理研究历史上的“日本热”。其经典性文献《Z理论》(William G. Ouchi, 1981)、《日本的管理艺术》(Richard Pascale, 1981)、《公司文化》(Terrence E. Deal and Allan A. Kennedy, 1982)以及《成功之路》(彼得斯和沃特曼, 1982)被誉为“管理新潮流的四重奏”。这些著作的一个共识是，日本企业的成功得益于日本特有的文化。这一时期经验分析盛行，突出特点是采用案例方法比较日美企业的异同，具有实证性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后，“硅谷模式”举世瞩目，比较研究的论著层出不穷，从文化比较到比较制度分析，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深刻、精细。例如，福山先生的专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Francis Fukuyama, 1995)研究了信任结构与企业模式的关系，令人耳目一新，堪称比较文化管理研究的典范。20世纪90年代以后，比较制度分析在美国出现并在比较管理研究中得到应用(Masahiko Aoki, 1990, 1999)。阿恩特(Arndt, 1981)和艾耶(Iye, 1997)利用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研究了跨国公司的营销管理战略在不同国家的适应性问题。卡洛里(Calori, 1997)等遵循权变的逻辑思路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构造了一个英法管理方式差异的影响因素模型。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称为制度主义与多样化阶段。进入21世纪，比较管理研究逐渐趋于平静甚至沉寂下来。

曾经风行多年的比较管理学，为什么会渐趋平静甚至有些沉闷？近年来，为什么许多管理学者对这门学科敬而远之？本文试图对此做出回答。本文认为，比较管理学面临着非常艰巨的学科基础建设任务。更重要的是，建设比较管理学科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的管理实践问题，为寻找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管理模式提供依据。管理学界发现，许多根植于欧美的西方管理理论很难解读中国管理实践问题，“因为我们的隐性知识依赖于本土环境，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假设它（我们的意识，假设）具有普遍性”（波兰尼，1967）。于是，一股管理情境化(Context)研究浪潮在近些年悄然兴起。在我国，许多学者讨论“中国模式”，但管理学家在这场讨论中却少有话语权。为什么？因为管理学家没有发掘出“中国模式”成功的管理元素。然而，“就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而言，如果将现代管理实践排除在外，如同人体解剖模型只承认骨骼系统而忽视血液循环和神经系统一样，是有问题的”（Amar V. Bhide, 2000）。不满于这一现实，一些优秀的学者发起创办“管理学在中国”学术论坛，旨在从活生生的中国管理实践中提炼具有本土特

点的管理理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编制的下一个五年计划也把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创新作为主要研究目标，设专项基金资助重点学科群开展研究。所有这些举措都非常重要，问题是，离开了不同国家管理活动的比较分析，怎么能够提炼出具有本国特征的管理理论呢？我们认为，只有在系统地揭示出不同国家管理活动的相同、相似和相异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提炼出中国管理实践的某些特征。因此，三年前，我们便和国内一些学者发起创办了《比较管理》杂志，举办专门的比较管理研讨会，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此基础上，又于2012年成立了全国首家国际比较管理研究院。这里，我们将就比较管理学的学科基础建设问题，依次探讨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以及由此引发的有关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以求教于诸位同人，以期引起更广泛的讨论。

一、比较管理缘何成了一门“沉闷的科学”

比较管理 (Comparative Management) 研究已历 50 余年，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和学术贡献。然而，近年来，作为一门重要的管理分支学科，比较管理学相对地边缘化了。在国际上，研究机构寥寥无几，相关的问题和方法论话题，也很少在著名大学中讲授，比较管理学成了一门“沉闷的科学”。尽管如此，在欧美的大学校园和研究机构中，仍然会捕捉到这朵奇葩散发出的芳香。虽然高潮早已成为过去，但仍有一些教学与研究机构在从事比较管理研究活动。在美国管理学会国际管理分会的主要研究议题中，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间的比较管理研究 (Comparative Management Studies Involving Two or More Countries) 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领域。美国管理学会是全美最权威的管理学研究机构之一。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 Dr. Alan S. Gutterman，成立了专门的比较管理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omparative Management Studies)，以从事比较研究工作。在高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设有专门的比较管理博士项目或专业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Comparative Management)，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也开设了相关博士课程。《日本的公司治理》(2007 年出版) 一书在剑桥刚刚问世不久，领衔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另一位作者 Jackson Gregory 就是比较管理学家。

在国内，伴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比较管理研究“四重奏”的鸣响。学界曾出现了比较管理教学与研究热潮，教材和专著不断涌现，20 世纪 90 年代末则逐渐归于沉寂。特别是，由于跨文化管理学（Cross-Cultural Management）日益活跃，许多学者改弦易辙搞起了跨文化管理，还有些学者把比较管理和跨文化管理混为一谈。迄今为止的管理学研究，仍然是关于管理一般原理和方法的研究，而对不同情境下管理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仅有一些“碎片式”的成果；偶尔也有一些“流星”在空中划过，但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更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分析范式和框架。从此种意义上说，比较管理的研究还是一个刚刚打开、尚未深入观察的“黑箱”。

比较管理的教学与研究为什么如此沉闷？稍加查考就会发现，这门学科的发展存在“瓶颈”式的障碍。我们知道，考察一门学科能否成立，要看其是否具备如下要素：明确的研究对象与边界；完整的学科体系和独立的科学范畴（或概念系统）；较为成熟的分析范式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而比较管理研究的现状如何呢？比较管理的学科基础存在很大问题：①相当一些成果过于简单化和经验化。许多研究只是简单地指出比较对象的异同点，缺乏对原因及过程分析；经验主义的东西比较多，缺乏必要的理论诠释。②研究对象不清晰，研究边界模糊。缺乏高度的抽象、归纳和综合，缺乏独立的科学范畴，因而难以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③研究范式没能确立，方法论开发比较薄弱。这是最具有制约性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禁锢了学科发展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同时，由于该学科所具有的复合型、多科性及复杂性的特点，也导致研究与教学人员望而生畏、敬而远之。因此，迄今为止，比较管理领域的许多问题，诸如，一国的管理特别是企业管理的方式和特点是什么？不同情境下企业管理的异同是什么？是哪些文化和制度因素决定了这种异同？各国企业管理方式根植于何种不同的背景和环境、经历了怎样的演化过程？管理方式与经济发展究竟是什么关系？各国的企业管理方式之间是否具有可选择性、可移植性和互补性？是否存在特定的比较管理分析框架、范式和方法？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和评价，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更何况，实践仍在发展着。

二、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现有文献对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不清。一种观点认为是管理现象。这种说法认为，比较管理学是建立在比较分析基础上的对管理现象进行研究的一门管理学分支。比较管理学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管理现象”的异同点、模式及其效果，并且研究这些管理现象与文化地域环境因素的关系，进而探讨管理经验和管理模式的可移植性，以达到“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目的（杨海涛，1988；罗鸿，2000）。我们认为，现象是事物所具有的表征化的、零散的、“碎片性”的特征或元素，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不说明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因果关系，更不能表示事物的本质。因此，现象不能作为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但它可以是科学研究入手的基础。另一种观点认为是管理方式。这里的管理方式是指在某种特定的环境和组织内部条件下，组织管理部门和人员履行管理职能的方式，也可以理解为管理系统的运行方式，包括执行管理职能的观念、价值标准、方法、分析技术等内容（黄群慧，2009）。管理方式在管理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它不是管理活动的全部，而且仍然具有某些表征化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仍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对我们理解研究对象富有启发性。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管理思想与实践。这种观点认为，比较管理是用比较的方法对本域的管理与异域管理的比较研究，是将两个或以上的处于不同情境中的主体加以对比考察。就中国的比较管理研究而言，一定是将中国情境中的管理思想和实践与中国情境以外的异域管理思想与实践加以对比考察的研究活动（曹德骏，2010）。显然，把两种层面且不同质的范畴放在一起作为研究对象也不合适。

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从学科分工上看，管理学研究管理的理论层面，比较管理学研究管理的实践层面，但并不是简单研究处于现象层面的管理实践活动，而是要揭示管理现象背后的运作机制，回答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不同情境下管理活动的差异，进而提炼出不同管理活动的相同、相似和相异性。因此可以说，比较管理的对象就是管理机制。这是因为，在科学研究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质量特征值或“典型化事实”是具有规律性的元素，才具有研究意

义。而支配管理行为、方式的管理机制更接近“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质量特征值”范畴。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去研究或提炼公理？我们当然也应该从定理（Theorem）、公理（Axiom）的角度去研究问题。问题是，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不知道定理、公理是什么。那怎么办呢？如果找不到公理性规律，我们就进行简单描述，用现象替代理论？显然不行。艾尔斯特指出，即使找不到公理性规律，我们也可以对研究对象做出解释和说明（Elster, 1998）。也就是说，在公理和现象之间还可以有一个解释层次，这个层次就是“机制”（Mechanism）。

“机制”一词源于机械学，意指机器的构造和运作原理，特别是机器在运动中各个部件之间的咬合关系，比如动力装置、传动装置以及制动装置之间的内在联系。生物学和医学通过类比借用此词去指生物机体结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其间发生的各种变化过程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相互关系。现在，机制一词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泛指系统内部组织结构及运行变化的规律。在任何一个系统中，机制都起着基础性的、根本的作用。在理想状态下，有了良好的机制，甚至可以使一个社会系统接近一个自适应系统（自组织系统），即在外部条件发生不确定变化时，能自动地迅速做出反应，调整原定的策略和措施，实现优化目标。

如果把公理、机制与现象理解为三个层面，机制位于中间层面。我们的研究或我们所要寻找的东西恐怕主要是在这个层面，也就是说，比较管理研究所形成的“理论”应该主要是这种机制理论。默顿在社会学界曾提出一种中层理论（Theories of Middle Range）：“中层理论介于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和对细节的详尽描述之间，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由于远离特定类型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而难以解释所观察到的事物，而对细节的详尽描述则完全缺乏一般性的概括。当然中层理论也涉及抽象，但是这些抽象是与观察到的资料密切相关的，是结合在允许进行经验检验的命题之中的。中层理论涉及的是范围有限的社会现象，正像它的名称所表现的一样。”（Robert Merton, 2008）这段话多次提及的“社会”一词，显然是指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但如果我们把它置换成“管理”或其他领域的观察对象似乎也同样适用。借用默顿的语言，机制理论实际是一种既可以够得着接得上公理又能够避开那些过于琐碎且互不联系的现象的“中层理论”。机制理论更多的是一种非普适性但局部适用的理论。我们可以用“机制”这个“中层理论”来比较、分析、解释各国的管理实践，寻求理论创新。图1是